

特稿

吴强

作者吴强为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政治学博士、原清华大学政治学系讲师，现为本土独立学者

“白纸革命” 与新流民阶级 的崛起

编按：这应该是中国本土学者关于“白纸革命”的第一篇有深度的研究文章。作者考察了“白纸革命”参与者的生存状况、相互联系方式、受教育程度等，提出正在崛起的“新流民阶级”构成了这一“几乎革命”的主体。这种情况是否“未来革命”的预演，当下自然不好判断，但显然值得高度关注。另外，是否可以用“新流民阶级”来描述“白纸革命”参与者的主体，也有待进一步探讨，欢迎就此赐稿。

2022年11月底，一场席卷全中国的“白纸抗议”运动终结了中国政府的“动态清零”政策和持续三年的防疫管控。这是一场高度自发的抗议运动，但是从这场运动席卷许多省市的动员和同步性、抗议诉求的力度和跨阶级的协调性等特质来说，它是1989年后中国内部发生的、最具挑战性的一场民众抗议。

1. 革命和问题：一次不可能的“几乎革命” (Almost Revolution)

这场仅仅持续几天的运动，以人民的名义结束了中国当局的“动态清零”管控，也以一场近乎颜色革命的抗议宣告了中国过去十年高压政治的破产。这个高压政治，源于2011年北非茉莉花革命爆发后中国执政党开始的所谓“社会管理创新”，即时任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主持的强化维稳模式，被胡锦涛的继任者习近平确定为中共在过去十年的核心任务，也是中共在过去十年加速转型为一个高度集权、排外反美的狂热民族主义政权的动力。

在政治上，防止颜色革命爆发、防止中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是茉莉花革命之后、也是习近平强调汲取前苏联“竟无一人是男儿”的教训，而展开党内反腐运动、党外清洗公民社会、切断中国NGO、互联网等与国际公民社会、国际互联网联系，以及倡导国进民退、打压民营经济、加速维稳和安全体系

扩权的唯一借口,也就是所谓“政治安全挂帅”的执政路线,并且籍此作为集中个人权力、废除党内(有限)民主,并且打破领导人不能连任超过两届政治传统的合法性来源。

然而,当习近平在“二十大”上以貌似消灭一切挑战的姿态顺利地第三次就任中共总书记职位之后仅仅一个月,“白纸”抗议就如颜色革命一般地爆发了,无论理论上还是事实上,都是对“二十大”体制的根本否定。与大学生和青年们在校园和街头举起无字白纸抗议的几乎同时,北京、上海的中产阶级市民们也大规模冲出了被封锁、隔离的住宅小区,如同1989年德国柏林墙的倒塌一般,人民以近乎起义的方式亲手结束了三年的“动态清零”政策下的疫情管控,也宣告了过去十年治理模式的破产。

这场抗议运动在几天后就消散了,参加街头抗议的青年人也陆续遭到大量逮捕。接下来,2023年3月举行的“两会”无悬念地通过了进一步强化集权控制的各项“改革”措施,这场抗议的冲击似乎被中国当局化解了,如同普通大众对三年疫情表面的“遗忘”。但是,这场抗议运动,却是在一个经由事后镇压再次证明中国政府一直不遗余力地、也似乎已经消灭所有革命条件和动员基础的条件下,超出几乎所有人的意料,以高度自发的方式大范围、跨阶级、跨民族地爆发的。

从此种相对严苛环境的、“不可能性”意义上的发生,将这场抗议运动称为“革命”似乎并不过分。而且,相比1949年后的历次抗议运动,在这场抗议的表达中,中国民众第一次直接质疑了政府和最高领导人的合法性,也是2009年“7.5”事件后第一次公开表达对新疆少数民族的同情。仅从这些高度自发的诉求来看,这场抗议运动与1989年前苏联、东欧国家发生的民主革命已经

相当接近,只缺知识分子和异议群体的政治声明。所以,就这场短暂革命的现实冲击性而言,例如其中所包含的对中国政治的否定,在中国当局的眼里,其震动应该不亚于一场真正的革命。

或许可以说,正是这些参与者以高度自发的呼吁和行动,改变了中国政治的“不可能性”。因此,如果分析这场运动的起源,首先需要从参加者的角度着手,特别是其中最具革命性的部分即那些街头抗议青年入手。他们是革命的主体,观察与分析他们与其他群体的关系,也就是他们的阶级状况,才有可能了解这场“几乎革命”的革命何以可能。

2. 事实和假说: 他们是谁?

如果观察2022年11月24日乌鲁木齐火灾前后参与抗议的人群,以及过后几个月陆续传出被以所谓寻衅滋事罪名逮捕、关押的抗议者,如果去除在南京传媒学院、清华大学等超过70所高等院校的校园里参与白纸抗议的大学生群体,可以发现一些有趣事实,因为另外有两个群体先后扮演着活跃的抗议角色:

1) 在2022年11月25日之后几天站在上海乌鲁木齐中路和北京亮马桥街头抗议的年轻人,多是受过大学教育、30岁左右的自由职业者、编辑、会计等的中产职业者,工作和收入受到过去十年政治环境变化的影响,更受到三年疫情管控的冲击,近乎城市知识无产者。其中女性居多,赋予“白纸抗议”运动与稍早在伊朗发生的女性抗议运动一定的相似性。

他们绝大部分属于政治“素人”,与中国现有政治异议者几乎没有联系,与海

外民主组织之间更无联系,更不属于“访民”或法轮功练习者群体等,宗教色彩也不明显。参加抗议的这些年轻人,绝大部分互不相识,都是单独前往、聚集,互相间只有松散、少量的微信和Telegram等社交媒体的群组联系。他们少有参加抗议活动的经验,但是或多或少参加过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沙龙活动等。

值得注意的是,对他们来说,仅有的社运经验就是其中若干人曾经参加过“弦子被朱军性侵案”的集体声援,也是Me Too运动在北京的一个具体行动。如果考虑到没有一位女性进入2022年秋天中共二十大的政治局、从而在中共建政之后第一次从最高层政治上抛弃了该党从成立以来就强调的男女平等的代表性,那么这样一种抗议不能不说意味深长,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中国年轻女性对中共政权最新性别政治的抗议。

在北京的新源里-亮马桥和上海乌鲁木齐中路的抗议现场,通过事后对目击者的询问和现场视频,可以观察到一方面抗议者身上的激动、愤怒和恐惧等情绪同时存在,这是现场聚集者相互之间能够感受到的。另一方面,还可以看到普遍的克制与沉静,以及演讲者较高的表达水平。形式上,不书写任何诉求文字的空白表达,白纸本身即是一种克制,也是一种自我保护,与不举出抗议标语的静坐类似,却充满了苏联时代政治笑话的荒诞色彩,但在中国都会城市的街头和校园里出现却具有震撼的视觉效果。

2) 2022年11月24日之前数日在郑州富士康工厂爆发的大规模工人抗议,以骚乱形式持续数天,要求厂方改善生活和生产条件、妥善对待感染新冠工友、及时支付足额工资和各项津贴等。根据在场工人的报告以及持续跟踪,可以发现,与在11月初因不满疫情管控而大批离开的河南本省工人不同,

参与骚乱的工人主要是此后新近补充或招募进厂的外省工人，年龄也是30岁左右。

在原本接近30万工人的郑州富士康厂区，这些新进工人规模近万，多数又来自珠三角地区，其中有些直接来自深圳“三和”劳务市场，即著名的“三和大神”，他们习惯于“日结”的散工模式¹。不同于郑州富士康原先的本地工人，这些新进“补充”工人互相之间也存在松散的微信和QQ联系，包括在珠三角地区被劳动中介招募后乘坐长途汽车途中才相互添加的微信群组。而QQ等社交网络在21世纪最初10年珠三角的工运浪潮中已被证明是关键的动员媒介。²

当2022年11月10日北京宣布微调“动态清零”的“十项措施”之后，郑州陷入了一边抓管控、一边抓生产的矛盾和脱节，导致大批员工辞职离岗，而这种管理的脱节在补充员工入厂后仍未得到改善。而且这些新进工人在入厂半个月后并未得到此前经劳动中介许诺的厂方奖金，矛盾开始升温。劳资双方之间的沟通失效，这些新进工厂的工人们与厂方安保人员的冲突便爆发了，演成大规模骚乱，犹如一场新卢德主义的运动。抗议和骚乱的场景首先出现在中国最新的快手和抖音等短视频社交媒体上，然后进入微信和推特等社交媒体，被广为流传。

从时间顺序上，郑州富士康工厂的工人骚乱揭开了“白纸革命”的序幕，也为“白纸革命”加入了工人阶级的重要角色。但是，如果考虑到其中“三和大神”即接近流民无产者群体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北京、上海街头抗议青年们类似的城市知识无产者的地位，白纸革命的性质便由这些关键的革命主体确定了。

基于实际处在社会隔离的两个群体所共同的无产者状态,理论上,我们可以假设他们共同代表着身后一个更为庞大、同质的群体,譬如一个新兴且急剧扩大的新流民阶级,那么白纸革命就是这个新阶级第一次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并且展现出这个新阶级的社会存在和政治力量。

从阶级结构变化的维度,这种新阶级假设就意味着一个有关阶级消失和演化的理论假说,相对于另一个层面的“不可能性”而悄然发生的革命,即:可能正是1990年代后期中国国企改革从阶级的意义上消灭了整个工人阶级然后加入全球化,中国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新流民阶级,并且极大影响了全球的新流民阶级化;进而,2011年后中国当局全面镇压消灭了公民社会、加速了极权主义之后³,这支长久以来处在“未完成无产阶级化”状态中的阶级加速了自我觉醒,并在三年新冠疫情的最后时刻展现了自己的政治力量。

3. 主体与隔离: 中国新流民阶级的形成

从这个假说重现中国的阶级演变,可以发现其中历程的惊心动魄,与中国文革后整个改革开放历史紧密相关。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建筑工人群体。笔者在几年前曾经对中国建筑工人的阶级状况做过大面积的田野调查和分析,相比潘毅等人2011年起的做的建筑工人调查,他们的情况有改善,但是没有根本性改善。

与其他农民工或者更大范围的流动人口相比,建筑工人在生产现场和生活情景中的不稳定感更强,有着更强的“游民”色彩,游离在城市空间之外,处于仿佛吉普赛人(与欧洲主流社会)的社会隔离状态。他们住在用挡板隔离起来的建筑工地,很难转行进入其他通常城市人口从事的行业,在离开工地

后也只能继续从事家装等相关行业,从而被地方当局视为所谓“低端人口”。其社会隔离度若以邓肯隔离系数(0-1)衡量,几乎为绝对的1,高于其他流动人口,但是和富士康的工人相比或者差不多。⁴对后者来说,高强度的工作或许是次要的,这种高度社会隔离所带来的职业绝望,包括厂区内部专门设计、故意制造的充满障碍的生活方式,才是中国富士康工厂曾经自杀高发的主因,也可能是他们在疫情期间不堪忍受纷纷离职的主因。⁵

这就是中国的农民工,中国新流民的最初形态。更多的农民工已经进入工厂,哪怕工资较低。但是,总体而言,他们的社保金实缴堪忧,缺乏长期劳动合同,却日益担当着传统制造业的主力,从造船到汽车,这种类似农民工的派遣工制已经成为用工主流。苏之慧(Sarah Swider) 2015年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建筑工人的著作,她观察到农民工总体上都属于新“流民”,将他们称之为“永久临时工”。这种新的“流民”(precariat)群体可称作流民无产阶级。

这种“永久临时工”的流民特性,堪称中国新流民阶级的典型代表:他们大多缺乏正式劳动合同,大多缺乏社会保险、缺乏完整的家庭生活、缺乏连续的月收入,工作场所常年转移,游离在主流城市社会生活之外。对这种“不稳定无产者”的描述,甚至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在170年前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more and more precarious”(越来越没有保障)来形容当时工人阶级不稳定的生活状况。

不过,中国新流民的这种状态,在学界被潘毅等人教条主义地看作处于“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状态中,从而长期以来都不被真正重视,似乎只有这种过渡状态才能体现出中国的特殊性。但是,当那些“三和大神”的工人在富士康爆发骚乱,显示出彻底的无产阶级特质之后,一切虚伪的、反革命的、和坚

固的东西才开始烟消云散。人们开始看到一些更普遍的联系，基于中国的“特殊性”，旧的社会（职业）隔离在两个维度上发生了极化。一个维度上，从建筑工人和所有农民工的“低端职业”到大量城市工作，中国的新流民阶级正在以前所未有的状态迅速扩张，并且形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阶级。

这种扩张的影响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对中国国内各阶级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全球化对全球新流民阶级的加速。英国人类学家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 2011)记录了靠近意大利弗洛伦萨的一个小城里主要从中国温州来的移民注册的4,200家公司和45,000名温州工人组成的“飞地经济”，然后在竞争之下当地人的就业减少了11,000人，许多人从正规工作转为“流民式”的工作。

区别于传统四个阶层——精英、工薪阶层、高收入者和传统工人阶级——在这些阶层之下的新流民，从失业大军和那些不愿混迹社会渣滓的底层群体中快速增加，处于不稳定就业或半失业状态。而且，因为中国的所谓特殊性，他们还加速推动着中国国内各阶级和世界范围的新流民化，在全世界范围制造出越来越多的流民无产者。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他们的就业不稳定，工作时间不固定，工资收入不稳定，而且规模巨大，涵盖了从底层工作到传统蓝领和白领工作，如工厂车间里的派遣工人以及许多白领工作岗位。

这里的“流民化”，都有着斯坦丁所定义的全球新流民阶级的一些共同特性：1) 基于不稳定劳动（工作）的特殊生产关系；2) 由于缺乏社会保险和帮助产生的特殊分配关系；3) 缺乏公民权利的特殊（与）国家关系。

并且，斯坦丁将这个阶级看作一个“危险的阶级”，远远超过他们被看作只

是一个“形成中的阶级”的速度，制造着新的社会不平等和不安全。这里的危险，是类比19世纪的手工业者和街头商贩，相对于当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共享的劳工神圣的道德观而言，他们属于“危险的阶级”，那么新流民阶级的出现，也挑战着今天仍占主流价值观的终身或固定雇佣观念以及相关的家庭、婚姻、财产等阶级再生产方式，进而挑战政治，形成一种“火海的政治”，如2011年的茉莉花革命和占领华尔街运动。

特别是2011年的茉莉花革命，爆发的阶级原因正是因为中国基于新流民生产模式的廉价纺织品造成突尼斯和埃及的传统纺织业破产，引致中产阶级长期贫困化之下产生了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新流民阶级，他们正是茉莉花革命的主体。

而在中国，过去十年为防范茉莉花革命所做的一切努力，似乎都在阶级结构的层面加速茉莉花革命的到来。一方面，不独建筑工人和农民工的流民化，在过去二十年期间，中国还出现了“网上流民化”：越来越多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流民，包括那些依赖互联网游戏、为互联网公司工作的“水军”或者为党工作的“五毛”、编写代码和程序却工作不稳定的“码农”以及在互联网商店和社交媒体出售物品和服务的微商群体等等，工作岗位和雇佣关系不稳定，更多的原本属于“高收入者”的“自我雇佣者”也在其中。

在过去三年疫情期间，这种下沉的流民化趋势席卷几乎整个私营部门，越来越多的职业人群都趋向邓肯隔离系数为零的状况。如齐泽克2012年所说的“因为一个长期工作而被剥削正在成为一种特权”的情形，已经在中国的各个私营行业普遍发生，甚至影响到公营部门。一个庞大的新流民阶级和一个有着党政和国企固定编制的体制内阶级的分野，正在形成中国新的阶级

对立。这是社会隔离发展的另一个维度,面对“体制内”的稳定工作,日益增长的新流民们正在感受到趋近1的邓肯隔离系数,即昔日建筑工人的社会隔离程度,社会舆论上反映为所谓阶级固化的意识、以及中产阶级们对阶级下沉的极度恐惧。

另一方面,这种劳动“特权”意义上的区分,反映的是新流民阶级的“非公民”状态(denizen),如斯坦丁在《流民宪章》所说,大部分流民作为非公民,所缺乏的是“要求权利的权利”。他们不具备公民的权利和身份,或者只有有限的公民权利。在融入全球化的初期,这种区别还可以用城乡二元结构来解释;在今天,几乎所有体制外的劳动者都会发现,他们同样面临对外地人设下的购房、购车、设立公司的障碍,遇到就业、子女教育和医疗等各方面公民权利的不平等问题,遑论政治参与或代表权。在疫情三年尤其是最后几个月,由医疗特权所折射出的两个阶级的不平等变得尤其强烈,也成为整个新流民阶级的相互认同。

具体来说,斯坦丁曾经归纳所谓流民化所带来的集体心理症候,他们都有着愤怒、异常、焦虑和异化的情绪,即“4A”(anger, anomie, anxiety and alienation)。这些情绪反映着他们的不稳定、不安全和不平等的阶级位置,也帮助我们辨认流民的存在,发现他们早已扩散到其他阶层,他们“不是农民,也不是传统工人阶级,不是党的干部,也不是新富,而是来自不同社会背景有着不同身份的农民工、低级白领、边缘化的待业毕业大学生”等,并且帮助这一阶级的自我认同,形成一个社会阶级。⁶

例如,早在新冠疫情之前,2017年北京市开展驱逐低端人口运动的过程中,这一认同纽带就在共情中建立了。在2017年11月的寒冬,北京的年轻人被南

城发生的野蛮行径震惊了，仿佛看到了纳粹驱逐华沙犹太人的场景，纷纷自发地救援和声援。一个被认为可能永远无法完成无产阶级化或者永远无法完成自身阶级化的新流民阶级，在那个寒冷的冬夜，已经悄然团结起来了。

而在过去三年疫情期间，因为更严厉的管控，包括无所不在的“大白暴力”、随时可能被强制送到隔离方舱的威胁、无预警无限期的居家隔离和就地隔离，以及强迫性的日常核酸检验和不透明的健康码系统，这些4A情绪似乎都被转化为更为普遍的恐惧。这也是2022年11月26、27日夜间北京和上海街头抗议人群当中最为强烈的共情纽带。在抗议人群的聚集中，人们能够互相感受到这种恐惧以及抗议所带来的解放感。

4. 结语

现在，我们可以确定，2017年的那个冬夜或许正是5年以后亮马桥革命的预演，而2022年11月底短暂的白纸革命则寓示着新流民阶级的崛起。那是否意味着未来革命的预演，还不得而知。

注释

- 1 “中国经济网”一篇文章这样介绍“三和大神”：“一群混迹于深圳三和人才市场，居无定所，也没有稳定工作，靠着做日结工作生活，然后干一天玩三天的年轻人，被广大网友称为‘三和大神’。他们不仅‘名声在外’，而且正在源源不断吸引其他外来务工人员加入队伍”。诸特立：《围观“三和大神”不该止于猎奇》，2018年08月21日，http://views.ce.cn/view/ent/201808/21/t20180821_30081638.shtml
- 2 Qiu, Jack Linchuan: “Network labour and non-elite knowledge workers in China Work”, in *Organisation, Labour & Globalisation*, Vol. 4, No. 2, pp.80-96, Autumn, 2010.
- 3 中国的公民社会是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发育、并在21世纪初借着互联网普及和维权运动迅速发展壮大，并在2011年茉莉花革命之后被中国当局视为颜色革命的主体，也就是颠覆政权的敌人。

- 4 所谓邓肯隔离系数, 又称邓肯隔离指数 (Duncan Segregation Index), 通常用来衡量性别的职业隔离程度, 在中国的农民工研究中也用来衡量农民工群体的职业隔离。邓肯隔离指数越大, 表明他们与城市劳动力在各类岗位就业比例的差异越大, 也就是就业分割程度越大。
- 5 他们的生活处在不稳定和割裂中, 年结制下仅仅每月不足千元的收入只够维持隔离在城市生活之外的单身生活的简单开销, 绝大部分缺乏完整的家庭生活。虽然没有全国性的统计, 但是笔者在多地田野调查的建筑工地其女性都不超过 5%, 男性建筑工人携家眷的情形也属极少数。绝大部分建筑工人, 无论婚否, 都处于集体的单身生活状态。他们除了长年出售自身的劳动力, 近乎一无所有。
- 6 Du, Caixia(2016): *The Birth of Social Class Online: The Chinese Precariat on the Internet*, doctoral dissertation, Tilburg University.

参考文献

- Standing, Guy (2011): *The Precariat: The New Dangerous Class*,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 Standing, Guy (2014): "Understanding the Precariat through Labour and Work." *Development and Change*, 45 (5): 963–80.
- Standing, Guy (2014): *A Precariat Charter: From Denizen to Citizen*,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 Standing, Guy (2016): "The Precariat, Class and Progressive Politics: A Response", *Global Labour Journal*, 7(2): 190.
- Swider, Sarah(2016): *Building China: Informal Work and the New Precariat*, Ithaca, NY: ILR/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Žižek, S. (2012): "The Revolt of the Salaried Bourgeoisie." *London Review of Books*, 34(2): 9-10.
- 潘毅, 吴琼文倩 :《2013 年中国建筑工人劳动合同的状况》, 《二十一世纪》, 2014 年第 6 期。
- 吴强: 《中国建筑工人阶级状况分析》, 《中国劳工通讯》, 2017 年。